

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

金基石 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

金基石 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金基石著. —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3. 6
(2005. 8 重印)

ISBN 7-5389-1147-2

I. 朝... II. 金... III. ①汉语—语音系统—研究—明清时代②朝鲜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韵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H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839 号

书 名/ 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
著 者/ 金基石
责任编辑/ 李贤吉
责任校对/ 崔 哲
封面设计/ 咸成镐
出版发行/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印 刷/ 牡丹江广播电视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417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001—1 500 册
书 号/ ISBN 7-5389-1147-2/H·31
定 价/ 6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金基石同志的《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明清时期朝鲜韵书中所反映的近代汉语音韵系统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最终成果有两项,一是这本《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二是《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金基石同志是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该项目于1998年通过鉴定以后,基石同志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精益求精,反复修改,终于成就了这部专著。在本书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基石同志陆续把阶段性成果发表在《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研究》、《语文研究》、《中国朝鲜语文》、《延边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过去我国的音韵学研究是厚古薄今、厚“论”薄“史”的,即历来都重古代,轻近代,重共时的断代分析,轻历时的流变研究。其实,因多方面的因素所影响,还存在着一个厚“内”薄“外”的问题,即重国内资料而轻域外资料。这些缺憾现在得到很大的改观。本世纪初开始,我国的传统音韵学吸收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重视起“史”的研究和汉语近代音问题。其中,元代音系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相当成熟,成果颇丰。最近20年来,学术热点逐渐转移到宋代音系和明清音系。明清音系的代表性韵书《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西儒耳目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五方元音》等,经过学者们的集中攻关,已经取得超越前贤的显著成就。域外文献或外民族材料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基石同志扩大研究视野,充分发挥自己汉朝双语兼通的优势,把目光转向域外材料,以朝鲜韵书作为明清音系研究的对象,填补了国内汉语近代音研究领域的空白。

我认为,这本书的研究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史论结合的研究角度。虽然过去一些学者也研究过朝鲜对音材料,但一般都局限于专书的断代研究,从“史”的角度,全面梳理明清时期的朝鲜历史文献,基石同志的这部著作可谓开了先河。他以15-19世纪近500年来的18部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共时的断代描写和历时的演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考察了朝鲜文献的谚文注音体系(正音与俗音、今俗音体系和左音与右音体系),并按流变顺序制成声母对音字表和韵母对音字表,使读者对明清音系的演变过程一目了然。在此基础上,史论结合,对明清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做出了多角度力所能及的评述。其中,对一些历史音变现象的描写和解

释相当独到且有深度。譬如,朝鲜文献中-m尾并入-n尾的记录是相当彻底的,但“怎”、“甚”两字忽-m忽-n,很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翻译这些书的人语音知识不丰富所造成的。基石同志通过详细考辨,发现这是当时学者们根据逆向同化现象,当作特例来处理的结果。又如,入声的归派问题,崔世珍在《翻译朴通事?老乞大》注音中,把入声只派入阳平和去声,派入上声的极少,跟《中原音韵》很不一致。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崔世珍的归派没有条理可言。可是,基石同志对照前贤对元曲、《等韵图经》、《李氏音鉴》等作品的研究成果和《辍耕录》对入声的描写等材料,指出崔世珍的归派是以当时口语音的实际观察为依据的,是有理可循的。史论结合的研究角度,使这部著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

其次是比较方法的灵活运用。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根据域外资料研究汉语,比较尤为重要。本著作的比较,包括朝鲜资料和中国资料的比较、不同年代韵书的比较、同一年代不同类型专书的比较、韵书音和会话读本音的比较,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朝鲜资料和中国资料的比较。基石同志在按年代顺序排列朝鲜对音资料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比较的方法,比较分析各年代的不同资料,尤其是通过对照中国的相关资料,相互参证,得出较为全面、较有说服力的结论。例如,尖团音问题,学者之间对其消失年代的看法,分歧很大。基石同志在全面比较前人研究成果和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朴通事新释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汉清文鉴》、《华音启蒙谚解》、《华语类抄》等朝鲜历史文献的谚文注音,并分析参照《韵略易通》、《李氏音鉴》、《圆音正考》、《等韵精要》、《蒙古字韵》、《韵籁》、《等韵学》等中国文献的记录,最终得出较为信服的结论:16-17世纪至少在北方话里还未出现尖团音合流现象,把18世纪看成见晓组和精组腭化的过渡期更为确切一些,可能19世纪初是尖团音完全混同时期。

再次是热点问题的关注。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至今还遗留着很多学术上的悬案,成为研究者普遍关心的研究热点。基石同志积极投入了热点问题的讨论。例如,浊音清化的过程、轻唇音的演变、影喻疑母字的合流、卷舌音化、见晓精组字的腭化、日母字的演变、-m尾并入-n尾、入声的消变及其归派、舌尖元音的形成、y韵母的产生、唇音字的开合口问题等,都是国内音韵学界意见分歧较多的热点课题。基石同志以朝鲜文献的对音资料为依据,一一讨论上述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譬如,入声消变问题,关于《中原音韵》时期是否存在入声,前贤或论其无,或证其有,各有相关材料依据,长期争论,难解难分。基石同志在中肯评议前贤各种观点的基础上,以《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朴通事?老乞大》对入声字的描写为依据,指出15世纪北方话俗音(口语

音)里还保留着喉塞音韵尾[ʔ],这个入声残余音到16世纪才完全消失。申叔舟在《四声通考》凡例中说:“入声之所以入声者,以其牙舌唇之全清为终声而促急。”“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驰。”可见,当时喉塞音韵尾与平上去有别,自成一调。诸如此类的精彩分析,在热点问题讨论中,随处可见。因为基石同志资料搜集广泛,语音分析精确,研究方法得当,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大部分都是论之有据,言之成理的。这不能不说是近代音研究的重要贡献。可以说基石同志是从汉语语音史角度研究朝鲜文献的重要贡献者,是第一线尖兵。

总之,基石同志的工作是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因为是开创性的,所以一些方面的研究还稍显粗糙,不够精细,很多问题有待今后继续深入探讨。值得欣慰的是,朝鲜历代学者经过几个世纪所撰写的珍贵文献,现在开始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必将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领域全面开花。我希望今后应进一步拓宽朝鲜材料与中国材料的比较研究,特别要开展朝鲜材料与中国方音材料的比较研究,也许这种工作将给汉语近代音系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带来新的突破。

是为序。

李得春

2003年5月于延边大学

目 錄

序	李得春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對象、目的及意義	(1)
一、研究對象	(1)
二、研究目的及意義	(2)
第二節 過去的研究概況	(4)
一、國內研究概況	(4)
二、國外研究概況	(6)
第三節 朝鮮音韻資料概觀	(7)
一、韻書類	(8)
(一) 用諺文注音的朝鮮漢字音韻書	(8)
(二) 以漢語學習為目的的漢朝對音韻書	(9)
二、辭書類	(10)
三、教科書類	(11)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6)
附注	(17)
第二章 諺文字母的轉寫原則	(20)
第一節 朝鮮韻書的注音體系	(20)
一、正音和俗音、今俗音	(20)

二、左音和右音	(22)
第二節 諺文字的音值	(24)
一、聲類的音值	(24)
二、韻類的音值	(32)
(一) 中聲及其音值	(33)
(二) 終聲及其音值	(38)
附注	(41)
第三章 《洪武正韻譯訓》和《四聲通解》的正俗音	(45)
第一節 《洪武正韻譯訓》的正俗音	(45)
一、聲母俗音	(48)
二、韻母俗音	(51)
三、《洪武正韻譯訓》正俗音字表	(53)
(一) 聲母正俗音表	(53)
(二) 韻母中聲正俗音表	(54)
(三) 韻母終聲(韻尾)正俗音表	(60)
第二節 《四聲通解》的正俗音	(63)
一、聲母俗音	(65)
二、韻母俗音	(68)
三、《四聲通解》正俗音字表	(70)
(一) 正音—俗音—今俗音字表	(71)
(二) 正音—今俗音字表	(73)
附注	(79)
第四章 聲母的演變	(84)
第一節 聲母體系概觀	(84)
一、《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的聲母體系	(84)
二、其它諺解書的聲母體系	(86)

第二節 聲母對音字表	(87)
一、牙音	(87)
(一) 見群 (仄)	(87)
(二) 溪群 (平)	(90)
(三) 疑母	(91)
二、舌頭音	(91)
(一) 端定 (仄)	(91)
(二) 透定 (平)	(92)
(三) 泥母	(93)
三、重唇音	(95)
(一) 幫並 (仄)	(95)
(二) 滂並 (平)	(97)
(三) 明母	(98)
四、輕唇音	(99)
(一) 非(奉)母	(99)
(二) 微母	(100)
五、齒頭音	(101)
(一) 精從 (仄)	(101)
(二) 清從 (平)	(103)
(三) 心邪母	(104)
六、正齒音	(105)
(一) 照牀 (仄)	(105)
(二) 穿牀 (平)	(107)
(三) 審禪母	(109)
七、喉音	(111)
(一) 影母	(111)
(二) 曉匣母	(111)
(三) 喻母	(113)
八、半舌音	(114)
九、半齒音	(115)

第三節 對幾個問題的討論·····	(116)
一、濁音清化問題·····	(117)
二、輕唇音的演變問題·····	(120)
三、影、喻、疑母的合流問題·····	(127)
四、卷舌音化問題·····	(130)
五、見曉組和精組字的顎化問題·····	(136)
六、日母字的演變問題·····	(146)
附注·····	(153)

第五章 韻母的演變····· (159)

第一節 韻母體系概觀·····	(159)
一、《翻譯老乞大·朴通事》的韻母體系·····	(159)
二、其它諺解書的韻母體系·····	(161)
第二節 韻母對音字表·····	(162)
一、東董送屋韻·····	(163)
二、支紙置韻·····	(164)
三、齊薺霽韻·····	(164)
四、魚語御韻·····	(165)
五、模姥暮韻·····	(166)
六、皆解泰韻·····	(166)
七、灰賄隧韻·····	(167)
八、真軫震質韻·····	(167)
九、文吻問勿韻·····	(168)
十、寒旱翰曷韻·····	(169)
十一、刪產諫轄韻·····	(170)
十二、先銑霰屑韻·····	(171)
十三、蕭篠嘯韻·····	(172)
十四、爻巧效韻·····	(173)
十五、尤有宥韻·····	(174)

十六、歌哿個韻·····	(175)
十七、麻馬禡韻·····	(176)
十八、遮者蔗韻·····	(177)
十九、陽養漾藥韻·····	(177)
二十、庚梗敬陌韻·····	(180)
二十一、侵寢沁緝韻·····	(182)
二十二、覃感勘合韻·····	(183)
二十三、鹽炎艷葉韻·····	(184)
第三節 對幾個問題的討論·····	(185)
一、-m 韻尾的消失問題·····	(185)
二、入聲韻的消失問題·····	(191)
三、舌尖元音的形成問題·····	(198)
四、y 韻母的形成問題·····	(204)
五、唇音字的開合口問題·····	(208)
附注·····	(213)
第六章 結 論 ·····	(219)
第一節 聲母系統·····	(220)
一、聲母系統演變過程概觀·····	(220)
二、對幾個聲母問題的結論·····	(222)
第二節 韻母系統·····	(225)
一、韻母系統演變過程概觀·····	(226)
二、對幾個韻母問題的結論·····	(228)
附注·····	(231)
參考文獻 ·····	(233)
后記 ·····	(240)
附錄(朝鮮文獻版本) ·····	(242)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目的及意義

一、研究對象

中國與朝鮮有着源遠流長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關係。由于朝鮮屬於“漢字文化圈”，在長期的歷史時期引進漢字充當國家的公用文字，各朝代都非常重視漢字、漢文的學習和漢語人才的培養。漢字早在公元前3世紀傳播到朝鮮半島，到了三國時代，高句麗第17代王小獸林王二年（公元372）就設立了“太學”，新羅也于7世紀設立“國學”，以教授《五經》、《史記》、《漢書》等儒家經典和漢文漢字。不過，這些教育機構主要以漢文教育為主，還未進行真正的外國語言教育。朝鮮三國時期，為了加強和促進與中國的交流關係，向中國派遣大量的留學生，學習中國文化和語言等，僅貞觀13年（公元639）高句麗、百濟、新羅派往中國的留學生就高達幾千人。高麗王朝（918—1391）忠烈王2年（1276），設置以“習漢語”為宗旨的國家語學機關“通文館”，並在同一個時期設“漢語都監”（1391年，恭讓王3年改稱“漢文都監”，並配置教授官）。這個通文館以後改為“司譯院”，“以掌譯語”。1392年李氏王朝建立以後，沿用“司譯院”的名稱，專管“肄習華言”之事和與中國的“事大交鄰之事”。以後，隨着交鄰關係的發展，司譯院逐步擴大為“掌譯諸方言語”的國家機構，先後設置了所謂“四學”，即漢學（1393）、蒙學（1394）、倭學（1415）、女真學（1426）。不過，由于當時“漢音有關事大”，所以漢學始終是司譯院最主要的科目。司譯院任命精通漢語和經學者為訓導官，訓導漢語學習，早期採用譯學學者契長壽的《直解小學》（今佚）為漢語教材。^①

在“世事中國”的對外政策和長期、正規的漢語教育體制中，李氏朝鮮時期涌現出世宗朝的李邊、金何、金聽，世祖朝的李興德、金有禮、申叔舟，成宗朝的張有誠、黃中、金自貞、李昌臣等著名漢學家和優秀的漢語譯官，特別是中宗朝出現了著名漢學家崔世珍，他為后世留下了異常豐碩的語言學研究業績。

學習漢語需要各種工具書和教科書，為此，朝鮮歷代王朝在大量引進中國典籍的同

時，召集漢學家陸續翻譯或編纂了不同類型的韻書、對譯辭書和漢語教科書。其中有，《集韻》、《禮部韻略》、《古今韻會舉要》、《蒙古韻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切韻指掌圖》等中國的韻書；《老乞大》、《朴通事》等漢語讀本；《洪武正韻譯訓》等中國韻書的朝鮮語譯本；《四聲通解》等朝鮮自己編撰的漢語韻書；《東國正韻》等朝鮮漢字音韻書；《譯語類解》等漢朝對譯辭書；《伍倫全備諺解》等漢語口語諺解書，等等。

一直到中世紀朝鮮沒有固有文字，一切行文記事都要借用漢字，因此百姓長期生活在“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的不正常狀態之中。李朝世宗大王“為此憫然”，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種“言文不一致”的矛盾，於1443年（癸亥年）創制朝鮮文字《訓民正音》，開創了朝鮮民族文字生活的新紀元。訓民正音是字母文字，因此它可以從根本上克服漢字傳統的表音法（直音法、讀若法、反切法等）的局限性，較準確客觀地給漢字注音。從這個意義上講，《訓民正音》的創制為漢語學習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從此，用訓民正音（諺文）翻譯或注音的各種韻書、對譯辭書、諺解書（以下通稱“朝鮮韻書”）等相繼問世。

二、研究目的及意義

我國的韻書是適應“賦詩押韻”的需求而產生的，因為方塊漢字單從形體上很難看出其聲音結構，而古代賦詩撰文必須講究格律，對用韻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客觀上要求有一個著之于文，以便參考的用韻規範。隋代陸法言的《切韻》（公元601），宋代陳彭年的《廣韻》（1008）和丁度的《禮部韻略》（1037）等傳統韻書，都是適應當時文人學士“審音辨韻”或者“應試作文之用”而編纂的。因此，這些韻書相對保守，與當時的實際口語音有着較大的距離。儘管以後出現韓道昭的《五音集韻》（1212）、元代黃公紹、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1297）、樂紹鳳等的《洪武正韻》（1375）等韻書，改革正統韻書體制，程度不同地反映了當時的北方話，但是都未能完全脫離舊韻書的束縛。^②

我國反映近代北方音系的韻書有：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1324），明代蘭茂的《韻略易通》（1442）、徐孝的《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樊騰鳳的《五方元音》（1654—1673）、畢拱宸的《韻略匯通》（1642）等。雖然這些韻書反映的是北方音系，但是由於受編纂目的、傳統觀念、編纂者或審訂者方音等的影響，或多或少存在着脫離當時實際口語的傾向。

與此不同，朝鮮各王朝編纂和刊行翻譯韻書和諺解書的目的不在於為“賦詩押韻”提供用韻規範，而在於用來識字正音，為培養譯官、譯學學者等漢語人才提供實用的漢語工具書，即為學習和掌握當時中國現實音即北方口語服務。因此，朝鮮漢學家們在翻譯中國韻書或自己編寫漢語教材時，非常重視聽取並記錄中國北方的“時音”（即當時現實

音)，而對“存古”的傳統韻書音採取了“不可強存而泥古”的態度（《洪武正韻譯訓》序）。

這種編纂宗旨使朝鮮韻書一直保持如實著錄中國北方現實音的傳統，即在《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解》等韻書中在著錄傳統反切音的同時，採取了“以中國時音所廣用，而不合韻圓者，逐字書俗音于反切之下”的並記正音（傳統韻書音）和俗音（現實口語音）的雙重注音方法。此后刊行的漢朝對音辭書和口語讀本則採用並記 15 世紀音（左音）和當時現實音（右音）的雙重注音體例。因此，在這一點上，朝鮮對音文獻比中國韻書更接近或正確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北方的實際語音。例如：

《中原音韻》是為元曲創作而編纂的韻書，是第一部真正反映北方話實際音系的曲韻韻書。這部韻書與中古音的主要差異是，聲母實現濁音清化，平聲分陰陽，入聲分別派入平、上、去三聲，分韻 19 部，但是還維持 -m 韻尾侵尋、監咸、廉纖韻。^③

《韻略易通》是《中原音韻》系統的韻書，比《中原音韻》晚 100 余年。這部韻書聲母分 20 類，但平聲不分陰陽，而且恢復了入聲，韻母也分 20 韻類，也維持 -m 韻尾侵尋、監咸、廉纖韻。這個 -m 韻尾在中國韻書里到《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和《韻略匯通》里才與 -n 韻尾合流，即侵尋、監咸、廉纖韻分別轉入真文、寒山、先天三部。

但是，朝鮮漢學家在《洪武正韻譯訓》（1445）里卻做了不同的處理。例如，在“正音”里維持入聲韻尾 -p、-t、-k 和 -m 韻尾，但在“俗音”里入聲韻尾一律標作“ $\bar{o}$ ”[-ʔ]，-m 韻尾也被 -n 韻尾所代替。（對 [-m] 韻尾，《四聲通解》（1517）在〈侵尋條〉注中寫道：“今俗皆呼為 n，間有用 m 呼之者”。）

成書于 14 世紀初的《蒙古字韻》，是我國第一部用漢字以外的表音文字八思巴文字注音的韻書。“由于這種韻書編纂的目的並不像傳統的漢文韻書那樣，服務于作詩撰文的押韻，而是用它來識字、正音，所以它不可能脫離當時的實際口語，而必須和當時日常使用的語音相接近或完全符合。這樣，它所反映的就不是書面上文學語言的讀音，而基本上是實際口語的語音。”^④ 不過，這部韻書里還保存着全濁聲母，某些喻三與喻四紐字相對立等，跟比此書晚幾十年成書的《中原音韻》有一定的差別。明代西洋傳教士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1626），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用羅馬字記錄漢語音系的著作。盡管對於它所反映的音系，學術界尚無明確定論，但是由于它首次用表音文字——羅馬字記錄漢語北方音，因此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被認為是研究明末實際語音的最好資料之一。與以上的國內對音資料相比，朝鮮韻書及漢語諺解書比《蒙古字韻》記錄漢語音系更全面系統，更準確客觀；與《西儒耳目資》相比，《洪武正韻譯訓》和《四聲通考》（1455）早兩個世紀，《四聲通解》則早一百年，因此其價值有過之而無不及。

總之，從近代漢語語音史的角度，較全面系統地發掘和整理明清時期朝鮮韻書的音韻資料，可以彌補國內近代音資料的遺缺，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和視野，因此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第二節 過去的研究概況

一、國內研究概況

本世紀初，我國的傳統語言學吸收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一些理論和方法，加強了“史”的觀念，開始重視近代漢語語音史的研究。錢玄同（1887－1939）首次把《中原音韻》音系劃歸漢語語音史的一個新的分期。接着，羅常培發表《中原音韻聲類考》（1932），創立了著名的“歸納法”，為《中原音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趙蔭棠繼續進行研究，著有《中原音韻研究》（1936），書中最受人稱道的是對跟《中原音韻》有關的、元末清初的重要韻書，一一“悉心考訂，明其源流，勘其異同，評其得失”。而后，陸志韋發表《釋〈中原音韻〉》（1946），利用八思巴字漢語資料，考訂了《中原音韻》的聲類和韻類。

解放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在近代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中，《中原音韻》的音系研究，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一大熱點。80年代上半期相繼出現三部關於《中原音韻》音系的專著：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1981），李新魁《中原音韻研究》（1983），寧繼福《中原音韻表稿》（1985）。楊著利用新發現的明正統刊《中原音韻》的新版本，又參證了八思巴對譯資料和同時期的一些音韻資料，對中原音韻音系重新作了考訂和構擬；李著分析了《中原音韻》音系的特點，提出了《中原音韻》的語音基礎是以洛陽音為主體的河南音的新說；寧著用音韻配合的表式列出了《中原音韻》的全部韻字，創立了“內部分析法”，考證翔實，論證有力，為後出轉精之作。

除以上專著以外，還有劉俊一的《關於〈中原音韻〉的“入派三聲”》（1980）、張清常的《〈中原音韻〉新著錄的一些異讀》（1983）、忌浮的《〈中原音韻〉的調值》（1986）等許多高水平的單篇論文。《中原音韻》的研究中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原音韻》語音基礎是以洛陽音為主體的河南音，還是當時的大都音，或者是流行於北方廣大地區，應用於各種交際場合的共同語的語音？《中原音韻》是否反映了當時的實際口語？當時北方中原究竟有無入聲？等等。1991年出版的《中原音韻新論》一書，匯集了近年來許多學者研究《中原音韻》的新見解、新成果。

其它研究近代漢語音系或語音史及韻書的專題論著還有：照那期圖和楊耐思的《蒙古字韻校本》（1987）、邵榮芬的《中原雅音研究》（1989）、薛鳳生的《北京音系解析》（1992）、李思敬的《漢語“兒”音史研究》（1994）、寧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

(1997)、楊耐思《近代漢語音論》(1997)等著作和蔣希文的《〈中原雅音〉記略》(1988)、冀伏的《〈中原雅音〉考辨》(1983)、忌浮的《論〈中州樂府音韻類編〉與〈中原音韻〉的關係》(1992)等許多單篇論文。

臺灣的近代漢語研究也有很大的進展，出版了董同龢的《漢語音韻學》(1968，書內第4章論早期官話，其中《中原音韻》部分比較詳細，對音值的構擬也非常精密)、楊家駱編著《中原音韻》(附校勘記，1964)、劉德智著《音注中原音韻》(1962)、陳新雄編著《中原音韻概要》(1976)、丁邦新發表《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方言現象》(1981)等。^⑤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臺灣發表的近代音的研究論文早期(1949-1972)有7篇，1973至1992年有60余篇。其中有：應裕康的《洪武正韻反切之研究》(1962)和《洪武正韻聲母音值之研究》(1970)，李崇寧的《李朝初期之韻書刊行》(1965)，朱尚文的《太和正音譜校訂》(1967)，林慶勛的《從編排特點論〈五方元音〉的音韻現象》(1990)和《刻本〈圓音正考〉所反映的音韻現象》(1990)等。

但是，我國學者在近代漢語語音的研究方面，“研究方法的運用和研究材料的利用上缺乏新的拓展”，“音韻史的研究也稍感不足”，尤其是利用朝鮮韻書或歷史音韻資料研究近代漢語語音的成果不多。^⑥

國內最早從漢語語音史的角度研究朝鮮資料的論文，是胡明揚的《〈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1962)。該論文首次全面考察《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的漢語、朝鮮語對音，整理出對音的聲母、韻母及聲調系統，可謂開了用朝鮮音韻資料研究近代漢語語音之先河。以後，胡明揚繼續研究朝鮮資料，發表了《〈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中所見的〈通考〉對音》(1980)。以後，李得春發表系列論文，較全面的考察了歷代朝鮮的漢語研究和朝鮮漢語語音資料里所反映的近代漢語音系。這些論文有：《評介歷代朝鮮的漢語研究》(1984)、《〈四聲通解〉今俗音初探》(1988)、《朝鮮學者對明清漢語音韻的研究》(1993)、《訓民正音的理論基礎與中國音韻學》(1994)、《關於標記在朝鮮諺解書中的近代漢語舌尖元音》(1997)等。李得春的專著《漢朝語言文字關係史》(1992)，在“史”與“學”相結合的層面上，較全面系統地闡述和研究了漢朝兩種語言文字的歷史關係。此外，還有陳植藩的《論崔世珍在朝鮮語文和漢語研究方面的貢獻》(1981)、孫建元的《〈四聲通解〉俗音、今俗音的性質》(1989)、《中古影、喻、疑、微諸紐在北京音系里全面合流的年代》(1990)、尉遲治平的《老乞大、朴通事諺解漢字音的語音基礎》(1990)等。這些論文從近代漢語音的研究角度出發，考察和分析朝鮮的各種歷史音韻資料，不僅為近代音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提供了新的佐證，而且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的利用上拓展和開辟了嶄新的領域。

二、國外研究概況

從前，韓國學者對朝鮮韻書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專書的斷代性研究上，如鄭然燦的《洪武正韻譯訓研究》(1972)、姜信沆的《四聲通解研究》(1973)、俞昌均的《蒙古韻略與四聲通考研究》(1974)、朴炳采的《洪武正韻譯訓新研究》(1982)、成元慶的《洪武正韻譯訓研究》(1990)等專著和李崇寧的《洪武正韻譯訓研究》(1959)、俞昌均的《朴通事諺解的中國音》(1969)、李東林的《洪武正韻譯訓和四聲通解的比較研究》(1969)、南廣佑的《新發見的崔世珍著〈翻譯老乞大〉上卷》(1972)、姜信沆的《華音启蒙內字音的音系》(1980)、金完鎮的《重刊老乞大諺解研究》(1992)等許多論文。

80年代前後，從中國近代漢語語音史的角度研究朝鮮韻書的諺文注音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如姜信沆的《朝鮮時代資料中反映的近代漢語音韻史》(1980)、李在敦的《中國近代官話的音韻演變研究》(1990)和《〈四聲通解〉中所反映的16世紀中國語音系研究》(1993)等。不過，韓國學者的近代漢語語音史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在臺灣學者的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如成元慶的《十五世紀韓國字音與中國聲韻之關係》(1969，導師林尹、高明、許世瑛)，金相根的《韓人連用漢字與韓國漢字入聲韻之研究》(1983，導師朱何、陳新雄)，康寔鎮的《老乞大朴通事研究》(1985，導師戴璉璋)、蔡瑛純的《從朝鮮時代資料考近代漢語音韻之變遷》(1986，導師李鎰)、朴秋鉉的《韓國韻書與中國音韻學之關係》(1990，導師竺家寧)等。這些論文既有斷代研究又有“史”的考察，在材料的利用和研究的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尤其是蔡瑛純的論文以《洪武正韻譯訓》、《翻譯老乞大》、《譯語類解》、《朴通事新釋諺解》和《華音启蒙諺解》、《華語類抄》等6部朝鮮資料的俗音及右音為研究對象，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漢語音韻的演變過程。

朝鮮學者對近代漢語語音史的研究論文或著作比較少見。安世鉉的專著《中國漢字音體系研究》(1986)，主要利用《朝鮮館譯語》研究14-15世紀漢語音，利用《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和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研究了16-17世紀漢語音。他的單篇論文《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標音里所反映的16-17世紀中國漢字音體系研究》(1988)，材料和觀點都跟《中國漢字音體系研究》基本一致，可以說是這部著作的縮寫。安世鉉的研究通過中外音韻資料的比較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資料及過去研究進展的了解不太全面，在結論上有一些不盡妥當之處。

總之，利用朝鮮的歷史音韻資料研究中國近代漢語語音史，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韓國，但是迄今為止在系統整理和描寫各時期朝鮮音韻資料的基礎上，從“史”的演化角度，全面考察近代漢語音系的研究成果還不多，很多資料還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